

◎ 国家图书馆

编

部级领导干部  
BUJILINGDAOGANBU

· 2004 ·

历史文化讲座  
LISHIWENHUAJIANGZUO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国家图书馆 编

BUJILINGDAOGANBU

# 部级领导干部

LISHIWENHUAJIANGZUO

# 历史文化讲座

· 2004 ·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04/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7

ISBN 7-5013-2792-0

I.部… II.国… III.社会科学—干部教育—教材 IV.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200 号

**书名**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04

**著者** 国家图书馆编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4.50

**版次** 200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ISBN 7-5013-2792-0/K·1197

**定价** 28.00 元

# 序 言

李 春 浩

当人类社会跨入 21 世纪之际，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为此，全党同志要按照十六大关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高度重视学习，切实加强学习，以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实践的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带头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领导水平。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的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和加强学习。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胡锦涛同志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中华民族有灿

烂辉煌的历史，有悠久绵长的文化，这是维系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有继承，才有创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领导干部应不断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拓宽人文视野，提高文化素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讲座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形式。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部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受到部级领导干部的好评。希望今后坚持下去，不断丰富讲座内容，越办越好，有更多的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国家图书馆作为讲座的承办单位，将讲座内容经过提炼推敲，编录成集，供更多的人参阅，对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收选的内容，也不一定尽善尽美，甚至亦或有不妥之处，应欢迎读者提出意见，以臻不断完善。

2003年2月27日

# 目录

- 李岚清 序言 / 1
- 金冲及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 1
- 吴宗国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与选官制度的发展 / 33
- 郝时远 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 61
- 陈绶祥 中国书画与中华文化 / 87
- 葛剑雄 中国疆域的变迁 / 109
- 张海鹏 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 / 147
- 陈维亚 中国民族舞蹈的欣赏 / 179
- 朱孝远 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 / 193
- 张立文 《周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239
- 俞孔坚 城市景观之路 / 271
- 乌丙安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及其深刻影响 / 315
- 吴良镛 总结历史，力解困境，再创辉煌 / 353
- 冯 远 法国印象派绘画历史及作品赏析 / 387
- 邓小南 “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 / 397
- 周志忍 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 / 433

金冲及

##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 根本问题

金冲及，1930年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金冲及自选集》；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以上两种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刘少奇传》、《朱德传》；和逢先知同志共同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和胡绳武教授合著《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要讲这个题目，大家首先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史究竟指什么？它的时间范围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历来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比较早一点，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另外一种说法，这些年来被比较多的人认可，那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以外，解放以前国内和海外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明清之际开始，把时间提得更早，但这种说法目前在我国国内没有多少影响。

为什么会有前面所说的两种不同说法？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日本去访问，广岛大学教授横山英就专门问了这个问题，说你们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究竟是怎么划分的？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说近代、现代这一类词，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变动的概念。譬如，我们今天的一切，在现在讲起来当然是现代史，但要是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它也变成古代史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以往我们比较多的把中国近代史说成从鸦片战争到五

四运动，这个大体上是从1949年以前流行起来的。那时候，范文澜同志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张闻天同志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讲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史。当时把近代、现代那样划分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1949年以前，当然不可能把近代说到1949年，现代只能说是“五四”以后了。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近代现代的概念应该有个变化。更为重要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在这段时期，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看法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为什么有时候还会只把五四以前称为近代史，我当时跟横山英教授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个理论问题，理论上这是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主要是个实际问题。因为以往搞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熟悉的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而搞现代史的，很多是从党史教师转过来的，对五四以前、特别是晚清的历史不那么熟悉，要把它统一起来研究，还比较困难。但是这十来年很可喜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从1840年到1949年，中间一共109年，讲一个约数，可以说是100年。这个100年对中华民族来讲，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挺身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是那么一个重大的转折。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中间能够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

样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

这段历史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如果用更宽广的眼光来看，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可以说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它以前的中国，是古代的中国，而在它以后的中国，是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它处在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我想这段话把这一段历史所处的地位讲得很清楚了。20世纪如果一分为二地看，上半个世纪从1901到1949年，主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从1949到2000年这后半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是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面将近50年的奋斗，正是为后面的50年扫除障碍。不走好前一步，就谈不上走后一步。江泽民同志用的提法是“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绕不开的前提。

对这一段历史，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里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响亮的口号。这里可以注意，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跟一般地讲发展不同，

复兴就是指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要重新振兴，这叫复兴。如果过去一直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今天只能叫发展，不能叫复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它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远一点，2000多年和1000多年前的汉唐盛世，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不用多说了。就讲近一点的，拿18世纪来说，康雍乾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站在世界的前列。清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戴逸教授，很早在一次讲座中讲过，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时世界上一共是九亿人，中国人有三亿，而整个欧洲只有两亿八千万。讲农业产值，中国也占着世界的三分之一。至于工业，当然那时候的工业很多还是手工业，如果都包括在内的话，中国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所占比重是33.3%，欧洲则占28.1%。那个时候，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尽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19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就是19世纪开始后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鸦片战争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呢？这话可以分两方面来说。我们称它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它还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假如它完全丧失了独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半封建国家，它的另外一面，又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这一面，也就谈不上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时间更晚一点。鸦片战争给中国

带来的一个标志性结果，就是中国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近代史划分从这里开始，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逐渐成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

还需要说明，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危险的局面。说起来很奇怪，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怎么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觉醒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能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很重要的人物——魏源的情况。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他在《海国图志》的序言里面，讲到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耻辱，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说尽管我们失败了，但是再回想一下当年在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新疆的准噶尔（西蒙古的一支）叛乱时，拿那时的中国地图从东北到西南划一条对角线，可以看出准噶尔控制的版图几乎可以跟大清帝国平分秋色。那时它不光控制着新疆，控制着中亚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控制着西藏、青海、外蒙古、内蒙古的大部分。魏源讲，你看准噶尔当年曾经那么猖狂，但这个叛乱最后不是也被削平了吗？因此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世界的情况，采取三个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把外国的坚船利炮这套办法学过来，我们就能够制住他。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大清帝国就不难恢复到过去那样“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魏源当时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的认识也只是到这个地步。

在这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恐怕很多同志都看过香港过去拍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你看皇上都到承德去避难，英法联军一把火把圆明园全部都烧掉。以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中国人来讲，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是很奇怪，那时候许多人并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感到这已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次英法联军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相反来帮助朝廷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再加上那时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推行的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相反都说这是中兴。现在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还把这时称为“同治中兴”。现在我们回头看觉得很奇怪，在这个时候怎么还能叫“中兴”呢？可是那时很多人却这样来认识。再往后，又发生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就是现在中越边界的友谊关这一仗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问题就是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那么屈辱的条约，所以还没有清醒过来。甚至到1894年，也就是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处于盲目自大中。郑观应曾写了一本书——《盛世危言》，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盛世危言》，并且是借了这本书来读的。那个时候郑观应主张改革，当时可以说他是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认为今天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还讲我是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假如他不这样讲，他的压力就太大了。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一般人对中国面对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认识还是很不足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这个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觉得世上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都不过是在那里循环不已。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人们一种所谓“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这种状况不经过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结果，周围客观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这些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把自己的领土台湾省割给了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赔款2万万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3000万两白银。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当时曾经目睹过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里说，他那时候在四川很偏僻的荣县，听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跟他的二哥就痛哭不止。《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他说以前我们只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而现在是败给一个东方的小国，而且又败得那么惨，签订的条约又那么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他说曾经“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意思是有谁知道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这一下，真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唤醒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04

了。

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多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振兴中华”，就是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来的。再如“救亡”这个口号，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提出来的。这两个口号从他们喊出来以后，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我们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那时候有一份《中外日报》上讲：我们在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事情并不是到这里为止。又过了两年多，德国强占胶州湾，然后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大连。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香港九龙的新界，1898年，签订的租借期是99年，说是99年，事实上是永远不准备还你的。在他们看来，哪有99年后还你的事情？他们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又过两年多，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运动起来以后，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事。这件事情不能小看，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所有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沙俄等等联合起来向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发动武装进攻，那是没有历史先例的。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整整一年之久，把首都划分成几个区。南边，和现在的宣武区、崇文区地界差不多。北边，除东城区、西城区以外，从故宫往北又划成一个区，由各国分别占领，中国老百姓要挂他们的国旗，他们还在北京附近到处烧杀抢掠，北京被外国人占领了整整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他那时在杭州读书，当听到京师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难到西安的时候，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一样，立刻放声大哭。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



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这七国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这个八国联军。他说，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到这个时候，却沦落到将要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两者之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的口号以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从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1931年发动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东北，再到以后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一步紧接着一步发生。在近代，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把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因为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不管是汉族人、满族人、蒙古族人、鄂温克人等等同样都沦为亡国奴。正如那时很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就是共同的命运。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前途，就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不论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国内、在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到处传唱，大家痛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确实是中国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讨论国歌，马叙伦先生第一个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国歌制定前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当时大家都赞成，因